

赵献涛◎著

民国文学研究

——翻译学、手稿学、鲁迅学

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

赵献涛◎著

民国文学研究

——翻译学、手稿学、鲁迅学

Z209.6
303

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民国文学研究：翻译学、手稿学、鲁迅学 / 赵献涛
著. —北京：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2015. 7

ISBN 978-7-5043-7450-9

I. ①民… II. ①赵… III. ①中国文学—现代文学史—文学史研究 IV. ①I209.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47132 号

民国文学研究

——翻译学

赵献涛

著

责任编辑

陈宪

封面设计

阿里斯

责任校对

张建

出版发行 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

电 话 010-86093580 010-86093583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真武庙二条 9 号

邮 编 100045

网 址 www.crtip.com.cn

电子信箱 crt8@sina.com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高碑店市德裕顺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字 数 260(千)字

印 张 17.75

版 次 2015 年 7 月第 1 版 201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43-7450-9

定 价 4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序

关于《民国文学研究——翻译学、 手稿学、鲁迅学》

曾经在相当长时间里，政治色彩覆盖了包括文学史在内的所有历史研究领域，沦陷区文学多有遮蔽，国统区文学偏重于批判方面。新时期以来，实事求是传统的恢复，带来了历史研究的巨大变化。先是注意到沦陷区并非只有汉奸文学与软性文学，大量作品曲折地表达出生生不息的民族灵魂；近年来提出的民国史视角与民国文学概念，在更为广阔的视野里逐渐还原包括抗战时期国统区文学在内的民国文学生态，因而越来越引起学术界的关注。赵献涛博士的新著取名为《民国文学研究——翻译学、手稿学、鲁迅学》，便体现出对民国文学概念的认同。的确，民国既然是中国的一个历史时期，包含着多维时空，那么，在这一时期发生的所有文学现象都应当纳入民国文学研究范围。

书中关于手稿学的思考与鲁迅手稿的个案分析，关于通俗文学作家对鲁迅的接受，鲁迅杂文的外来影响源等，都有独到的发现与启人之处，但就我的阅读感受而言，最能见出历史眼光的还要说是关于沦陷区与国统区翻译文学的考察。19世纪末以来，翻译文学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参与了中国文学乃至社会文化转型的历史进程。翻译引进的作家、作品与文学典型，走进了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与社会生活，诸如清末民初的罗兰夫人、索菲亚、茶花女，五四时期的易卜生、托尔斯泰、泰戈尔与娜拉、维特、卖火柴的小女孩，三四十年的艾略特、萧伯纳、高尔基、肖洛霍夫、海明威与《母亲》、《铁流》、《毁灭》、《青年近卫军》，五六十年代的奥斯特洛夫斯基与保尔·柯察金等，八九十年代的卡夫卡、萨特、马尔克斯、帕斯捷尔纳克、索尔仁尼琴与《城堡》、《恶心》、《百年孤独》、《日瓦戈医生》、《古拉格群岛》等；话剧、新诗、报告文学、小

说等文体自不必说，文学语言与普通话的定型与演进，也融入了翻译文学的尝试、转化与创新。近年来，学术界对翻译文学的认识虽然有所提高，但是，重视程度尚嫌不足，翻译史料的钩沉与梳理也有相当大的空间。献涛在这部新著里，对沦陷区、国统区的翻译文学用力颇多，分地域考察了东北沦陷区、华北沦陷区、汪伪时期南京、沦陷时期上海、抗战时期重庆、成都、桂林等地的翻译文学生态，填补了翻译文学史的一些空白。在考察中，民国文学视角显然发生了作用。

献涛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读书时，我与杨义先生共同担负指导之责。献涛敏于思考，勤勉执著，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已经出版的博士论文《鲁迅杂文与中国杂学》，就见得出其独辟蹊径的眼光与扎扎实实的功夫。题为《民国文学研究——翻译学、手稿学、鲁迅学》的书稿再次让我看到他的努力。我为献涛能够一步一个脚印地向前探寻而欣喜，期待他有更多的学术发现。

张中良

2015年3月21日 写于上海交通大学

目 录

上卷 翻译学

第一章 沦陷区的翻译文学	2
第一节 重写民国翻译文学史	2
第二节 东北沦陷区的翻译文学	12
第三节 华北沦陷区的翻译文学	19
第四节 日伪时期南京的翻译文学	27
第五节 上海沦陷时期的翻译文学	35
第二章 抗战时期其他地区的翻译文学	43
第六节 抗战时期重庆的翻译文学	43
第七节 抗战时期成都的翻译文学出版	51
第八节 桂林文化城的翻译文学	63
第九节 抗战时期昆明的翻译文学出版	70
第十节 抗战时期香港的翻译文学出版	76
第十一节 抗战时期华中地区的翻译文学出版	83

中卷 手稿学

第一章 纯理论的手稿学	94
第一节 建立文学研究的“手稿学”	94
第二节 手稿心理学的几个问题	103

第三节	手稿社会学	110
第四节	手稿与作品汇校	115
第二章	应用手稿学	126
第五节	手稿与文学类课程教学	126
第六节	手稿批评之一：《鲁迅批判孔孟之道手稿选编》汇校 举要	133
第七节	手稿批评之二：《鲁迅手稿选集三编》汇校举要	147
第八节	手稿批评之三：《鲁迅手稿选集四编》汇校举要	158

下卷 鲁迅学

第一章	鲁迅及其作品流传研究	170
第一节	民国史视角下的鲁迅	170
第二节	民国时期国文课本中的鲁迅作品	173
第三节	华北沦陷区的“鲁迅”	183
第四节	旧体诗词中的“鲁迅”	191
第五节	大学语文教学中的鲁迅作品	206
第六节	通俗文学家的鲁迅接受	215
第七节	美术史家视野中的鲁迅	219
第二章	鲁迅及其作品渊源研究	223
第八节	杂学家鲁迅	223
第九节	鲁迅笔名与《周易》	227
第十节	2005年版《鲁迅全集》的注释问题	232
第十一节	鲁迅杂文与《百喻经》	238
第十二节	鲁迅杂文与汉语外来词	246
第十三节	鲁迅中国小说史学的反思	255
	主要参考文献	261

附录	265
附录一 翻译文学书目的一点说明	265
附录二 《故事新编》中的“人物出走”	267
附录三 读《民国时期自然灾害与现代文学书写》	270
后记	275

上卷

翻译学



第一章

沦陷区的翻译文学

第一节 重写民国翻译文学史

历史学界有“中华民国史”的研究,文学界内“民国文学史”的概念逐渐被认可,“民国翻译文学史”在译界却鲜有提及。目前译界使用较多的概念有“二十世纪中国翻译文学史”、“近代翻译文学史”、“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中国 20 世纪外国文学翻译史”等。“近代”与“现代”的概念在翻译界的使用,显而易见,是历史学界“近代史”、“现代史”概念移用的结果,但近代、现代这些概念的多义性以及背后隐含着的历史目的性使得这些概念挪用于翻译文学史并不合适。因为近代、现代这些术语隐含着社会历史发展自觉追求近代化、现代化的目的论色彩,隐藏着用理论逻辑替代历史事实的危机。在 20 世纪 80 年代重写文学史思潮的影响下,“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的概念被大量使用,翻译学界加以借鉴,创造出“二十世纪中国翻译文学史”这一术语用以指称过去百年的翻译文学史,自有其学术价值和意义,但难以彰显中华民国时期(1912 - 1949)的翻译文学与特定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的深层关系。在一定意义上,“民国翻译文学史”是一个比较宽泛、中性的概念,不指向任何价值判断,既是一个昭示着历史变迁的时

间概念,又是一个可以将翻译文学放置在特定历史背景下加以观察的概念。因为其自身的囊括性、包容性,民国翻译文学史指称 1912 - 1949 年的翻译文学史比较合适。

当我们从时间的意义上,即从民国时期的意义上考察已经出版的翻译文学史著作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已经出版的名目不同的翻译文学史存在着一定的缺陷,主要的缺陷就是从既定的意识形态出发去建构符合意识形态需要的翻译文学史,将中国近代史、现代史的书写模式套用在翻译文学史的写作编纂上,致使翻译文学史成为了近代、现代革命史与政治史的补充、附庸,以至于所出版的翻译文学史呈现残缺不全的面孔:沦陷区的翻译文学没有纳入视野之中,通俗文学家的文学翻译被有意遮蔽,赴台文人、国民党文人、政治中立文人的文学翻译被放逐,史学观念上依然有着强烈的进化论痕迹。这些问题迫使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写民国时期的翻译文学史。

地理范围上,应包括沦陷区的翻译文学

抗战时期的翻译文学,目前为止所出各类翻译文学史专著,主要叙述国统区的进步翻译家、解放区的翻译家,而对沦陷区的翻译文学却鲜有涉及。1895 年中国台湾割让给日本,进入长达 50 年之久的殖民统治时期;1932 年,伪满洲国成立,东北沦入日伪统治下长达 14 年;1937 年日本占领北京,标志着华北沦陷,同年,日军侵占上海、南京,华东大部分国土沦陷;1938 年,日军入侵广州、武汉,华南华中地区部分沦陷。在长达 8 年、14 年甚至 50 年之久的沦陷时期,在这样广大面积的沦陷区域,生存着、活跃着大大小小的、数目众多的翻译家。这些翻译家的身份非常复杂:有的是迫于各种无奈而滞留于沦陷区的进步人士,他们采取默默抗争的态度,坚决不与日伪统治者合作;有的迫于物质经济、政治压迫的原因,步入日伪机构担任伪职,但内心深处并没有完全泯灭民族精神;有的则完全丧失了民族立场,心甘情愿地为日伪统治者效劳,美化“大东亚共荣”,向国人输送具有殖民意识的日本文学。沦陷区的译者、译文、译著,情况十分复杂,不是一句简单的话就可以说得清楚。

因为在沦陷区生活着大量的翻译家,沦陷区的翻译文学呈现出自身的繁荣和复杂:各类报纸杂志上可以看到翻译文学,各类出版社所出的图书中也有大量

翻译文学,甚至一些翻译作品当时根本没有机会出版,作为“地下翻译”而存在着。整个沦陷区的翻译文学与国统区、解放区相比,有着自己的特色;每一片沦陷区也因为不同的原因而呈现不同的面貌。国统区、解放区的翻译文学多为抗战的、进步的文学,沦陷区的翻译文学多为娱乐性、趣味性、甚至宣扬美化日伪统治的文学。以北京、天津为中心的华北沦陷区,以上海、南京为中心的华东沦陷区,其翻译文学数量最多、质量也最高;东北沦陷区、华中沦陷区次之,华南沦陷区翻译文学成就最低。北京、天津、上海、南京因为一些译家的滞留和既往历史的文化积淀,也因为这些城市是日伪统治区域内的政治经济中心、重心,所以这几个城市在译著的出版上领先于其他城市,如武汉、长沙、广州、香港等。抗战初期,香港的翻译出版成就不凡,但随着香港沦陷,流动于香港的文人学者纷纷内迁,抗战后期香港的翻译文学出版奄奄一息;随着抗战的胜利,香港的翻译文学出版才呈现出复苏的气息。战时的国际关系影响着译者国别文学的选择,翻译文学以自身独特的方式参与着战时政治。民族抗战影响着译者的翻译动机、翻译方法,译者以自己的译本表达着抗战时期自己的身份、立场和声音。超过任何一个时期,译文译作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地纠结在一起,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关系。

抗日战争时期,因为政治、战争的影响,中国整个国土分为三大区域:国统区、解放区、沦陷区。在翻译文学的数量、质量上进行相对的比较,国统区大于沦陷区,沦陷区大于解放区。这样一种观点的形成,不是出于丝毫的政治偏见、殖民意识,而是出于对翻译文学史实事求是的综合考察。之所以会出现如此的局面,根本原因是因为在国统区、沦陷区存在着数量上多于解放区的文学翻译者。翻译人才之多、翻译队伍之大,以及出版机构之多、文学期刊之繁,这些硬性的因素是使国统区、沦陷区翻译文学成就高于解放区的主要原因。从翻译文学的地理分布上可以看出,除政治原因之外,文学传统、文学惯性是决定翻译文学发展的一只“看不见的手”。

沦陷区报纸刊物上的翻译文学单篇作品、出版社所出翻译文学的单行本种类,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做出准确的数字统计,还没有摸清底数,^①更鲜有深

① 无论沦陷区的翻译文学,还是国统区的翻译文学,我们都没有弄清楚诸如单行本种类数量、译者生平事迹、原著者国别生平、出版机构性质等具体问题。

入研究,甚至对它们的存在有意忽视。忽视沦陷区的翻译文学,整个民国时期的翻译文学史就是残缺不全的,也就不能够清楚、全面地描述出民国时期翻译文学的整体面貌。

文体范围上,应包括通俗文学的翻译

20世纪80年代以来,重写文学史成为一个时代的主要思想潮流。在这种潮流的影响下,一批批新的现代文学史著作以崭新的面貌出现,文学史的重写取得了一定的成就。虽然有人提出重写翻译文学史的主张,但与之不相称的是,翻译文学史并没有多少改观,依然陈旧。

民国文学的研究上,我们突破了“新文学”与“旧文学”对立的思维模式,将所谓旧文学纳入到了文学史的叙述框架之中,并予以它们价值重估的意义,但在翻译文学史上,这种“新文学”与“旧文学”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依然存在,严重制约了翻译文学的研究。这表现在,目前为止的翻译文学史,没有给通俗文学作家的文学翻译、通俗文学的翻译予以重视。民国时期的通俗文学翻译家,“这是一批被遗忘或者受到不公评价的外国小说翻译群体”,^①重写翻译文学史,很有必要将通俗文学作家的文学翻译、通俗文学的翻译纳入进去。

通俗文学家的创作目前已经得到了充分的认可,对于他们的研究颇有方兴未艾之势。通俗文学家不仅创作通俗文学,而且从事文学的翻译,他们的翻译是他们创作的催化剂、动力源。如果忽视他们的翻译,就不能正确而深刻地理解他们的创作。通俗文学作家多是左手创作、右手翻译的双面人。民国旧派言情小说代表作家之一李定夷译有《辽西梦》、《急富党》等,滑稽体小说作家徐卓呆译述小说有《地狱礁》、《人肉市场》等,范烟桥编译《孤掌惊鸣记》,贡少芹译《一粒钻》、《变相之宰相》等,张舍我译述《臆爵案》,赵苕狂译有《死死生生》、《亡国复仇记》等,包天笑译述《未来世界》、《拿破仑之情网》等,恽铁樵译述《乡里山人》,陈小蝶、李常觉译有《弃儿》、《恐怖窟》等,周瘦鹃译著更多,有《情充》、《犹太灯》、《福尔摩斯》、《井底埋香记》、《社会柱石》、《影中人》、《赌窟奇案》等,程

^① 汤哲声、朱全定:《清末民初小说的翻译及其文学史价值》,《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4年第2期,第33页。

小青译著有《冬青树》、《古甲虫》、《假警士》、《摩登奴隶》等。程小青、周瘦鹃的翻译贯穿了整个民国时期,而且数量巨大。“(程小青)他给中国文坛带来了真正意义上的侦探小说,他是真正深谙侦探小说创作并全身心为此投入的中国作家。谁也不会否认这位‘中国侦探小说之父’为侦探小说的翻译和创作所作出的贡献。”^①虽然不从事通俗文学创作,但对通俗文学翻译一往情深的,尚有林俊千、郑狄克等译家,他们所译作品数量之大,只要翻阅一下有关翻译文学书目之类图书就会知晓。

通俗文学作家的翻译虽然也有欧美经典作品,但主要还是通俗文学题材作品:侦探小说、言情小说、科幻小说、冒险小说等。在通俗文学的翻译上,通俗作家是行家里手,他们为民国时期翻译文学的输入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中华民国肇造之初到新文化运动发生之间的一段时期,是通俗翻译文学最为走红的时期。因为晚清林纾“林译小说”的影响,通俗作家的翻译文学多延续着林纾的路数,取法林琴南,在体裁选择、翻译方法和翻译目的这些方面,都可以看到林纾的巨大影响。

新文化运动发生之后到抗战爆发的一段时期,通俗文学的翻译相对比较沉寂。一方面因为新文化运动的巨大冲击,使得通俗文学的刊物阵地、读者市场大面积缩小,一方面因为革命文学的倡导、左翼文学的流行以及国家所面临的危机困境,使得感时忧国的文学成为时代的主流,通俗文学翻译也就难以顺应这样的时代潮流、适合读者的审美需求而呈现萎缩的状态。

抗战时期,国统区、解放区的通俗文学翻译不及沦陷区的通俗文学翻译那样众多和繁盛。^②这种局面的出现,主要是因为抗战文化、战时体制、国际形势、作家分布等诸多因素影响的结果。国统区的文学要担负民族解放的重任,虽然不乏借通俗文学翻译以表达民族意识、抗战救国立场的译者译作,但通俗文学翻译在这方面是弱项,为此就没有特别盛行起来。但因为在国统区活跃着很多通俗文学作家,又因为国统区的政治统治不是铁板一块,通俗文学的翻译依然延续了下来。在解放区,因为通俗文学作家本身就稀少,因为高度突出文学的政治功能,所以解放区的通俗文学翻译乏善可陈。在沦陷区,因为日伪的残酷统治,迫

① 禹玲:《近现代文学翻译史上通俗作家群》,《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3年第5期,第45页。

② 这仅仅指通俗文学与其他文学题材在一定区域所占比例而言,如果按数量统计来论通俗文学翻译,国统区大于沦陷区,沦陷区大于解放区。

使一些翻译家转向通俗文学的翻译;同样因为日伪统治者装点升平、麻痹沦陷区人们斗志的需要,也极力鼓励、赞助通俗文学的翻译出版,沦陷区的通俗翻译文学数量上相对可观。翻译文学在一定区域内的成就,与翻译文学家的地理分布状态存在着密切的关系。

抗战之后到新中国成立,通俗文学翻译不见起色,自此通俗文学翻译就告别了它曾经拥有过的历史辉煌。通俗文学是民国文学的一支重要力量,与新文学如同车之两轮、鸟之双翼,共同构成民国文学的版图;通俗文学的翻译同样是翻译文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与经典文学作品的翻译一道构成民国翻译文学的绚烂画面。然而时到今日,民国时期,究竟有多少通俗文学翻译单篇作品和单行本,有多少通俗文学翻译家,我们尚没有搞清楚。

政治范围上,应包括政治边缘译家

因为一定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既往的翻译文学史著作,写进去的都是政治上进步、政治上正确的译家,即,政治立场上归属于或倾向于中国共产党政治主张、政治革命的译家,政治评价上符合国家意识形态的译家,主要是那些具有民主主义思想的进步译家和共产党党员身份的译家。与之相对照,政治边缘的译家、政治上中立和落后保守反动的译家,既出的翻译文学史著作没有予以提及和重视,没有给予他们一席之地。为此,我们看到的译家是这样一个与新文学史叙述的作家相互对应的行列:鲁迅、周作人、胡适、郭沫若、郑振铎、徐志摩、茅盾、巴金、瞿秋白、林语堂、梁实秋、李健吾、李劫人、田汉、穆木天、穆旦等。文学史的编纂体例影响了翻译文学史的书写模式。

翻译文学史是一定时期译家译作的历史梳理,民国翻译文学史其写作的目的在于反映出民国时期翻译文学的整体状况,即将此时间段的译作、译文、译著、译论,尽可能完整地、真实地予以爬梳、呈现,从而贴近历史的原貌,描述出历史的原汁原味,还原出历史的真实状况。尽管这样一种历史真实的追求是不切实际的,因为任何历史书写都带有书写者的主观偏见,历史书写究其本质而言,是一种想象和虚构。虽如此,我们还是要尽最大可能地将历史的面貌描述出来,让历史上的译事浮现出来。有意忽视、遮掩历史的真实,是对历史的不尊重。在民国时期的翻译文学实践上,边缘的、政治上中立与落后的文人同样从事于翻译

文学活动,他们的翻译成就尽管不如(但部分高于)一些民主人士、进步人士,但这个客观事实的存在却不容抹杀,应该得到承认,然而我们目前所出的翻译文学史,因为特定意识形态的影响、左右,却没有将这批译人写进去,他们被放逐在了历史之外。

因为反对“民族主义文艺”和左翼文学图解政治倾向而自我标榜为“第三种人”的杜衡,在翻译文学的成就上可圈可点。杜衡译有法郎士著小说《黛丝》、王尔德著小说《道连格雷画像》、海涅著诗歌《还乡集》、杰克·伦敦著小说《革命的女儿》、劳伦斯著小说《二青鸟》、波兰普鲁士著小说《哨兵》、哈代著戏剧《统治者》。从中可以看出,杜衡的翻译行为特别自觉,彰显着译家的主体性,这种主体性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他的译作多为世界著名作家作品,他的译作涉及法、英、德、波兰等众多国别,他尝试着小说、戏剧等不同文体的翻译。然而就是这样一位成就不菲的译家,因为与大陆过去的政治观念、文学观念相左,在各类翻译文学史著作上,难以寻觅到杜衡的影子。

延安整风运动之后被处决的王实味,其杂文和思想近年来得到了客观的评价,但其翻译文学却鲜有人触及。王实味不仅是一个杂文家、文艺理论家,而且是一个成就斐然的翻译家。王实味译有德国霍布门著小说《珊拿的邪教徒》、法国都德著小说《萨芙》、哈代著《还乡》、英国高尔斯华绥著小说《资本家》、美国奥尼尔著《奇异的插曲》。无论从原著的选择上,还是译文本身的质量上,都表现了作为翻译家的王实味的卓越才华。

在讨论大众文艺、“第三种人”等问题时,与左翼文学工作者展开激烈论争的韩侍桁,以翻译丹麦批评家勃兰兑斯的《十九世纪文学之主潮》而名垂于世,这是众所周知的译事。不仅在文学理论的翻译上,而且在文学作品的翻译上,韩侍桁都表现出一个译家的非凡才华。韩侍桁译有森鸥外等《现代日本小说》、苏联伊凡诺夫著《铁甲列车》、俄国郭歌尔著小说《搭拉斯布尔巴》、托尔斯泰著《哥萨克人》、俄国卢斯达维里著《虎皮骑士》、高尔基著《俄罗斯人剪影》。就是这样一个才华出众的翻译家,因为曾经受到过左翼批评家的批判而一直消失在翻译文学史的视野之外。

赴台文人、国民党文人、反动文人甚至汉奸文人之中,也很有部分文人从事文学翻译的活动,时间或长或短,成就有大有小,在民国历史上留下了译文译作。

赴台译家黎烈文^①、许粤华、洪炎秋，国民党文人张道藩、林徽因、郑学稼，落水文人梁得所、予且和朱朴，托派文人王凡西等也都有译作问世。翻译文学的版图应该呈现这些译者，呈现这些译者，不是意味着政治上对于他们的完全肯定；我们在肯定他们翻译文学的成绩时，无妨对他们其他方面做出历史性批判。国民党文人张道藩改译法国器俄著戏剧《狄四娘》、法国约瑟·叶尔曼著戏剧《蜜月旅行》，在当时具有一定影响。赴台文人许粤华（1912—2011），浙江海盐人，许天虹胞妹。1929年与黄源结婚。1935年夏去日本留学。1938年随同黎烈文去福建永安，参加改进出版社工作。1941年与黄源离婚，之后与黎烈文结为夫妻。1946年春，应台湾省省长陈仪之邀，黎烈文偕妻许粤华到了台湾，致力于战后文化重建工作。1947年任台湾大学外文系教授。1972年到美国定居。许粤华主要译作有：《书的故事》（1931）、《十诫》（1940）、《罪》（短篇集，1941）等多种。^②这样一位擅长译事的女性译家，应该在翻译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中国自古以来的修史传统，注重实录的精神。修史的今天学人，应该秉持这样一种实录精神，有闻必录、立此存档地将过去的翻译文学呈现出来，将历史的原貌尽最大可能地还原给读者。任何一种历史叙述，都不可能事无巨细地记述过去的一枝一叶。历史的记载都只能是一种大笔勾勒。即使是大笔勾勒，也要勾勒出这些高山峻岭般译家译著，而不能故意对他们的存在视而不见。

史学观念上，应摆脱进化论

所有的历史都是关于历史的修辞想象。历史总是被叙述的，是一种文本建构。文学史在观念上已经逐渐摆脱了进化论的影响，文学有发展，但同时有中断、退化，甚至死亡。翻译文学史作为文学史的一种，既出的各类翻译文学史在写作上却没有完全摆脱进化论的痕迹。“‘重写文学史’的基本策略就来自新历史主义的理念，即将先前单数大写的、政治化的文学史，改写为复数的、小写的、多元的、民间化的文学史。”^③重写翻译文学史也就是将先前单数大写的、政治化

① 黎烈文译事见张旭：《湘籍近现代文化名人·翻译家卷》，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80—428页。

② 李同良：《嘉兴翻译家研究》，九州出版社2013年版，第146—147页。

③ 张丽军：《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方法论十六讲》，山东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203页。